

推动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繁荣发展

常保国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核心阅读

当前,中国政治学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肩负着时代赋予的重任。政治学研究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扎根中国大地,聚焦本土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研究中,注重拓宽视野,培育世界眼光,为维护我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为促进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政治学以政治现象和政治规律为基本研究对象,围绕公共事务主题,聚焦国家、政党、公共权力等问题进行研究,致力于为党治国理政提供学术支撑。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政治学在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为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们已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阶段新任务对中国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政治学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肩负着时代赋予的重任。广大政治学研究者应做到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适应改革发展稳定的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智力支持和学术支撑。

坚持科学理论指导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推动中国政

治学繁荣发展,必须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政治学理论研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历史观、发展观、矛盾观指导实际问题研究。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文献研究与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研究结合起来,让政治学理论与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中国政治学研究要有所作为,必须扎根人民之中,为人民做学问。比如,系统研究人民主体地位及其价值,深入阐释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在人类政治发展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研究人民在重大历史变革中的作用;研究人民如何有效参与国家治理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路径,如何建立科学的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体系;研究公民权利保障和利益表达机制,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以及社会矛盾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研究如何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等。

创新发展中国政治学,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大视角系统阐释研究中国道路的成果还不够丰富。深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国际社会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表述阐述好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和道理,讲好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故事,让国际上更多人了解、认同中国自主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创新点。

聚焦本土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广大政治学研究者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炼新概念、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扎根中国大地开展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目前在我国学科专业目录中,政治学是法

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下设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进一步提升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水平,需要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研究、比较政治研究等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加强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如法政治学、国家监察学、环境政治学、信息与网络政治学等,使政治学学科体系更加完善。

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术体系,需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开展系统深入研究。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研究如何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如何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研究提高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具体路径;研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的着力点、发力点;等等。

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需要打造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说,应努力对我国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必须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炼标识性概念、范畴,阐释好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中国方案。一个时期以来,学者们从相关学科视角对中国道路、中国民主政治展开研究,形成了大量论文、专著,但从政治发展的大视角系统阐释研究中国道路的成果还不够丰富。深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国际社会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表述阐述好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和道理,讲好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故事,让国际上更多人了解、认同中国自主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创新点。

拓展世界眼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随着综合国力增强,中国能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大国作用,大国担当成为近年来政治学研究中的高频词。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世界的和平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紧密联系的当下,中国政治学在立足本土研究的前提下,还需放眼全球,拓宽国际视野,展现更大作为,为维护我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促进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比如,加强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研

究。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不同文化、制度、发展水平国家的人民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这些全人类共同价值,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如何理解这些价值的涵义,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有何不同,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实现这些价值的具体路径等,都是值得政治学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再如,加强对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以及国际关系准则的研究。中国政治学要致力于研究合理的国际秩序构建原则,研究如何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研究联合国和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如何平衡推进发展、安全、人权等领域工作并制定共同议程。还应强化联合国组织及国际法、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研究。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今年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政治学要系统研究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研究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贡献等。

整合汇聚资源

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高等学校、党校、科研院所和党政机关等部门单位。目前,全国120余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院系,其中拥有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的高校40所,拥有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的高校110余所。同时,众多政治学类学术期刊、政治学会等组织也是政治学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的重要平台。

整合共享学术资源,增进学术交流,推动学术共同体建设,是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要进一步加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党政机关有关部门等研究力量的交流,畅通不同机构之间交流的渠道。加强政治学学术组织与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术组织的交流,可以定期就一些重大研究主题开展跨学科、跨学会交流。还可以建立共享性学术资源平台。各高校、研究机构等都有自己的优势研究领域,在这些领域积累了较多研究资源和成果。可以依托大数据技术建立开放的学术资源平台,实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提高研究效率。加强政治学研究的国际交流,推动政治学研究者以多种途径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发出中国学术声音,扩大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影响力。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学术随笔

XUE SHU SUI BI

将比较方法用于政治学分析由来已久。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政治学分支学科,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赢得国家独立,这些国家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如何实现现代化、怎样获得持续发展,成为比较政治学重点关注的问题。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比较政治学研究较多关注制度比较,即预设一种理想的制度模型,以此为标准去衡量研究对象的政治制度。从制度模型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政治学研究方法、充实了政治学理论,但也存在明显缺陷。早在古希腊,就有学者在比较了100多个城邦政体后指出,在一个城邦表现优良的政体,在另一个城邦可能就是无效政体。有政治学研究者认为,各国政治制度之间最重要的分野,不在于治理的形式,而在于治理的效能。事实上,当今世界实行同样政体的不同国家,其治理状况也有着天壤之别。这显然不仅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存治理能力的巨大差异。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是对各国治理能力的一次大检验,也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在不同国家发生。各国制度形态不同,应对这一挑战的理念、政策、效果也不同。感染率、死亡率、经济复苏情况等都可作为衡量制度效能、治理能力的标准。从治理能力、治理效能等方面综合进行比较研究,同时考虑国情差异、文化差异,这样的研究才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可见,评价一种制度的优劣,离不开对治理效能的考察。国家治理能力体现制度效能,有必要将国家治理能力研究作为比较政治学的重点研究领域。

政治学是历史的产物,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政治学。我们不能把既有的西方政治学理论视为政治学理论本身,认为研究这些就是研究政治学;也不能在实证研究中聚焦一些碎片化问题,纯粹为了研究而研究。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学首先是立足本国实际的治国理政学说,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来构建政治学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当代中国正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为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者而言,应潜心研究当下的‘新历史’,以我国政治实践为立足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从实践出发深入阐发政治运行特点,不断丰富政治学理论体系。一个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外政治学研究者致力于探索解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背后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原因。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者,尤须扎根中国大地开展研究,围绕我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特殊问题,围绕我国和其他国家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提出体现中国立场的理念、主张、方案,努力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学术流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要部署,为政治学研究者把握新时代的新特征新趋势,进一步深化治理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中国政治学应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中国语境和实践对治理理论进行多样化阐述、本土化提炼,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展研究,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政治学学术支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中国大地不断丰富发展中国政治学,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中国政治学研究者肩负的历史使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在比较研究中彰显治理效能

杨光斌

在时代变革中抓住机遇

深化公共管理学交叉研究

黄飏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全球性问题考验着人类的治理智慧和治理能力。与此同时,全球数字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人类生产生活正在发生深刻改变。作为一门致力于提升公共治理水平的学科,公共管理学需要不断解决新问题、回应新挑战。长期以来,公共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大多关注一般的管理目标、原则、方法等,较少涉及心理、环境、健康等特定领域的专门问题。而公共管理学的实证研究,则倾向于讨论专业领域内与公共管理活动相关的技术内容,较少涉及影响技术实现的公共管理要素,如领导、激励、协调等。面对新形势新问题,要在保持原有研究优势的同时,推动公共管理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促进不同学科融合创新。

完善公共管理学概念体系,广泛汲取与公共管理实践相关的学科知识。在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历程中,研究者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借鉴了不少概念,用以研究讨论公共管理实践。面向未来,公共管理研究者要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密切关注心理学、环境科学、医学、地理科学等相关学科,引入更多与公共管理实践相关的新概念,深入讨论概念之间的层次性、兼容性,在个体、组织、环境、空间等多个层面,形成更加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公共管理概念体系,努力与其他学科形成概念上的相互衔接,为学科交叉提供概念基础。

拓展公共管理学研究内容,融合多学科前沿知识。公共管理活动涉及领域广泛,不同领域的技术进步不断对公共管理实践提出新要求。传统的公共管理学研究倾向于将其他学科的技术

性内容视为给定的前提,忽视了技术性内容发展变化对管理内容带来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既不利于拓展公共管理学的关注领域,也不利于提升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公共管理学研究要从现实需求着手,关注相关学科领域技术性内容的发展变化,融合更多学科前沿知识。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拓展公共管理学研究内容,创新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开展整体性、全周期的公共管理学研究,使研究成果更富解释力、更具前瞻性,为更好解决复杂社会问题提供方案。

运用数字技术为实现学科交叉融合提供路径。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实现公共管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便利。数字技术能够弥补缺失、动态、精准的信息在不同主体间快速交换,实现点对点、低成本的信息流动。数字技术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广泛运用,可以增强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分析能力,增进其对现实的理解、把握和预测,帮助研究者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推动公共管理理论创新。这将为公共管理学研究搭建起一个更加包容的平台,使其能够兼容其他相关学科前沿知识,引入更多与公共管理实践相关的新概念,深入讨论概念之间的层次性、兼容性,在个体、组织、环境、空间等多个层面,形成更加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公共管理概念体系,努力与其他学科形成概念上的相互衔接,为学科交叉提供概念基础。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提供新的研究素材和分析技术

大数据助力政治学研究

夏珉

信息。这些数据都可通过数据爬取技术直接获取。第一类数据经过分析处理后,可以反映群众关注的议题类型分布、政府相关部门回应的特点和问题解决程度。还可以进一步分析特定类型群体在什么时期大致提出哪些类型的诉求。第二类数据主要用于分析网民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看法和态度。对微博等社交媒体的数据分析,不仅关注具体话题,还将话题和情感、偏好等因素分析相结合,呈现网络民意对某个具体事件的态度演变过程及影响网络民意变化的具体因素。可以说,网络大数据的应用极大丰富了政治学对网络民意的研究方式。

对文本转换后的大数据进行分折。在网络大数据之后,研究者尝试挖掘其他非现成的、更具独特性的大数据信息。这类信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公开平台获取的大数据文本。这类数据通过数据爬取技术获得,但发布这些数据的平台并非人人皆知,需要研究者去搜寻。目前,政治学研究者较多关注并取得研究进展的大数

据主要有:从裁判文书网获取的司法大数据,从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库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库中获得的文本大数据等。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加大,这类可供研究的信息资源会越来越丰富。另一种数据需要先进行文本转换才可使用,如对历史资料的研究。相当数量的历史资料是以图片形式而非文本形式存在的,这就需要通过识别技术将图片信息转换为文字文本,然后进行大数据分析。这类数据的获取难度较高,不过一旦形成数据库,对政治学研究则有较大帮助。

大数据为政治学提供新的研究素材和分析技术,但并未改变政治学研究的本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素材和新工具,政治学研究者需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陷入对数据和方法的盲目追求中。同时,应结合政治学研究本身的特点,发挥大数据技术优势,推动信息技术在政治学研究应用中取得更多突破。一是开发更多样化的大数据类型。目前,政治学研究分析的大多是文本形式的大数据。文本信息只是浩瀚

信息世界中的一种,还有图片、音频、视频等大量信息类型有待开发利用。这些类型的大数据有的在商业领域已有较成熟的应用,研究者可考虑以合适方式将其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二是探索更前沿的大数据分析技术。现有的分析技术还离不开人工标注,需要政治学研究者从大数据中抽出很小一部分,对这部分数据进行人工阅读和标注,然后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让计算机基于人工标注的数据去分析剩下的大量数据,尝试得出相应结论。由于人工标注的数量不等,分析的效果也参差不齐。在文本挖掘上,需要进一步开发更先进的技术。三是实现更复杂的大数据分析目标。现有的大数据分析主要是对数据所体现的政治现象进行描述,尚未具备解释政治现象、发现运行规律以及进行预测的功能,这需要更进一步的技术支持和研究突破。从这个角度看,大数据的开发利用在政治学研究领域还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者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学苑论衡

XUE YUAN LUN HENG

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型信息分析技术被应用到政治学研究中。许多政治学研究者采用当前比较成熟的大数据爬取、大数据文本分析等技术,获取新的研究素材并进行分析整理。同时,以亿万为量级单位的大数据本身就具有政治学研究价值。可以说,大数据为政治学带来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进一步拓展了政治学研究领域。

基于大数据对网络民意进行研究。网络上有许多现成数据可以用于对网络民意和政府部门回应进行研究。一些政治学研究者常把两类网络大数据用作分析素材:一类是政府网络问政平台上的群众留言及相关部门回复信息,另一类是主流媒体网站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网民发帖